

乌审革命斗争史料选

——乌审文史资料（第二辑）

革命斗争史料选

编

政协乌审旗委员会
乌审旗延安精神研究会

Ushen of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History

烏市革命斗争史料选(上册)

——烏市文史资料(第二辑)

政协烏市旗委委员会
烏市延安路神研室
编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

乌审革命斗争史料选(上册)

编委会

主任:吴兆军

副主任:章嘎 万源山

成员:韩怀德 周子杰、郝继忠 查干其劳 王悦峰

策划:吴兆军 章嘎 万源山

编务:章嘎 万源山 韩怀德 郝继忠

责任编辑:郝继忠 万源山 韩怀德

封面设计:布拉格

封面题字:满达呼

出版:政协乌审旗委员会 乌审旗延安精神研究会

承制:隆达印刷厂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9.38

字数:172千字

内新图准字(2008)第139号

版次: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印制

印数:1—1500册

前 言

1925 年，乌审草原上已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6 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运动蓬勃发展，以席尼喇嘛乌力吉杰尔嘎勒为代表的革命者以“独贵龙”为基础，建立了乌审旗劳动牧民政权“公会”。1927 年，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开始在旗南部活动。1928 年，共产党纳林河小组建立。1934 年，共产党掌高图支部、乌审旗工作委员会成立。1935 年，苏维埃巴图湾乡政权建立。从此，乌审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广大蒙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民主政权和民族武装，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过浴血奋战，历时二十多年，赢得了民族翻身解放事业的彻底胜利。

这一段历史用鲜血和生命著成，在鄂尔多斯乃至内蒙古自治区的历史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风云激荡的岁月留下了永恒的历史记忆。进入 21 世纪的人们不该也绝不能忘记漠视这段永远的辉煌和荣耀。作为后来者，我们面对历史，面对不可忘却应当继承发扬的精神财富，传承光大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基于此，政协乌审旗第十二届委员会决定对已有的地方革命史、党史资料进行二次抢救，并重新编辑内部出版。

这次所收录的大部分文稿为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由乌审旗党史、地方志工作机构整理编辑的部分革命史、党史资料。文稿展示了乌审旗蒙古族人民为反抗旧政权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压迫,抵制当局对草原无节制放垦,保卫牧场家园的历史画卷;大篇幅集中反映了乌审蒙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几代人前仆后继,同没落的黑暗统治势力展开英勇斗争,最终获得民族解放事业全面胜利的辉煌历程。绝大部分文稿为当事人亲历、亲闻者亲述,一部分文稿是在结合档案文献史料和口述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现在,上述亲历亲闻者多已辞世,资料不可再生,加之战争年代的档案文献资料非常稀缺,因而这部分资料的史学价值无可替代,填补了一段历史记载的空白。对于当今的人们,这些资料非常珍贵难得。为了让“死”资料“活”起来,再次印行,存史、资政、宣传教育,为现实和未来服务,意义深远。

政协乌审旗委员会文史委、旗延安精神研究会发起组织,在旗档案局(史志办)的配合下,将旗档案馆所藏资料和散见于各处的资料集中起来,进行筛选编排,选录部分文稿,编辑印刷。对于文稿的处理上,尊重原稿的面貌,仅在脱、衍、误和标点符号上做必要的校勘和补正。

文稿由于成稿时间前后不同,对同一史事和人物的记载和表述有所不同;有些史料的选用上,由于忆述者、整理者占有材料的多寡及认识的角度不同,前后有不

致的地方,甚至相互抵牾,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事隔几十年,历史事件中的核心、关键人物不是当时牺牲,就是后来故去,幸存者在抢救资料时年事已高,忆述缺乏档案文献资料的利用,不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情况;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时间、过程及认识历来就有争议歧说,忆述者忆述不免就有自己的选择;对亲历、亲闻口述史料抢救整理的工作者,大多都不是专业的史学工作者,缺乏科学的整理方法,故而在文稿中出现一些不应有的缺憾,在史料的考订、整理上不够全面、深入、细致。文稿中的观点与认识,只能说明在历史阶段里,亲历亲闻者和革命史、党史工作者对历史的一些初步认识和有益探索,只能代表当时史学界的一些认识,不全部是定论。这些文稿我们照样收录。有的忆述和认识在后来史料考订研究上已有突破和新的进展。读者在研究利用时,需要分析,前后对照、鉴别。

我们不能苛求于忆述者和整理者,没有他们那种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们连这个也看不到。我们应当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是他们留下了一段最不能忘却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料的逐步发现和挖掘,对 20 世纪上半叶的历史研究将会有进一步的可信成果问世,这是我们的期盼,也是我们编辑出版此书的目的之一。

目 录

鄂尔多斯地区“独贵龙”运动概况·····	宝音	1
“独贵龙”运动和席尼喇嘛革命·····	张秉义 何知文	15
蒙族代表团参观延安·····	那顺巴图	52
乌审旗第一个蒙古族代表团参观延安·····	那顺巴图	56
调解乌鄂冲突·····	延光先	60
巴图湾谈判·····	王治邦忆述	63
二十二支队情况·····	田万生忆述	70
回忆二十二支队情况·····	刘生富忆述	72
关于蒙汉游击队的情况·····	杨勤生忆述	74
征途漫忆·····	王子义忆述	78
蒙汉兄弟情·····	张秉义忆述	134
乌审风云·····	白进宝忆述、整理	153
念珠联情·····	何知文	235
毛罗章木素谈那素滴勒盖·····	何知文	252
纳宋典勒格的崛起·····	张秉义 何知文	272

鄂尔多斯地区“独贵龙”运动概况

宝音

19 世纪 20 年代末期，鄂尔多斯人民为了自己的生存，在同国内外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创造的“独贵龙”运动，是广大蒙古族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具有民族特色的斗争形式。在斗争中，他们有勇有谋，形式多样，充分发挥了蒙古民族的聪明才智，在我国民族斗争彪炳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

“独贵龙”运动是蒙古族人民传统的革命斗争形式。这种斗争形式的产生，是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有着密切关系。我们知道，逐水草游牧的蒙古民族居室是撑拆自如的圆形蒙古包。在日常生活中，蒙古族人民在自己的蒙古包里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尊卑长幼，按蒙古包的形状围成圆圈坐着议事。后来，他们在漫长的生活斗争中，

又把这种家庭内的议事形式搬到社会上，即村社乡情集会议事时，也都是围成圆圈辩论是非。久而久之，他们把这种议事形式称为“独贵”（汉译圆圈）。当人们把这种议事形式用于政治斗争的时候，也就很自然地形成“独贵龙”（龙在蒙语中为复数）。当用这种形式把各阶层人民组织进来议事，成为一种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时，人们把它称为人民“独贵龙”运动。由于鄂尔多斯人民传统的坚持采用这种组织形式进行反抗斗争，所以，人们把鄂尔多斯地区掀起的人民反抗运动叫做“鄂尔多斯人民‘独贵龙’运动”。

（二）

鄂尔多斯人民“独贵龙”进行斗争时，所有的“独贵龙”成员围成圆圈就坐，进行议事和斗争，并且根据斗争需要又分为开口“独贵龙”和封口“独贵龙”；当大家围成圆圈就坐时，为了使人们在“独贵”内进出方便，有意识地在“独贵”的一面留个口子，这种形式的“独贵”叫做开口“独贵龙”。封口“独贵龙”适宜于聚众议事，而开口“独贵龙”则一般适合于对斗争对象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也就是让被斗争的人从“开口”进入“独贵”的中央，“独贵龙”成员面对面向他们提出质询或责问，面对面进行是非争辩。当然，开口“独贵龙”也罢，封口“独贵龙”

也罢，都是依据斗争需要决定的，并无不变之规。随着鄂尔多斯人民居住条件的改善，也就是由蒙古包改为筑屋定居后，有的“独贵龙”就依照房屋的形式，围坐四方形进行斗争的形式。例如，1905年乌审旗西部地区的人民“独贵龙”就是围坐成四方形进行斗争的。人们把这种四方形的“独贵龙”叫做“都日卜勒金”（汉译即四方）。“都日卜勒金”这种形式适用于较小范围内的户内议事斗争，这种斗争形式只流行几年就停止了。所以，乌审旗人民仍然把人民“独贵龙”运动称之为“独贵”、“都日卜勒金”之事。不过，“都日卜勒金”并未能取代“独贵”。况且除乌审以外，在鄂尔多斯其他旗内未组织过“都日卜勒金”，他们仍然按传统形式组织人民“独贵龙”进行斗争。

鄂尔多斯人民举行“独贵龙”，并不讲究场地等条件。他们在住户门前、王府附近、召庙院地、草牧场、沙梁上都可以席地坐成“独贵”，进行议事，举行斗争。人民“独贵龙”的阶级成份相当广泛。不论是喇嘛俗人、官人庶人、富人穷人、台吉与属人，也不论男女老少尊卑之事，只要拥护与支持人民“独贵龙”的观点，都可以平等权力参加这个组织。参加“独贵龙”的每个人都有提议、申诉、喊冤、控告等权力。一般来说，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时，人民“独贵龙”运动的主力军是广大劳动人民和下级官吏、下级喇嘛、下级台吉等。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时，则上自鄂尔多斯盟

长、各旗扎萨克、仕官、台吉，下至广大劳动牧民，都来参加。他们这种爱国斗争规模之大，参加的人数之多，都是空前的。

由于每个历史时期斗争的目标不同，人民“独贵龙”的参加人数，运动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也不等。多则几千、几万人，少则十来个人到几十个人；有由个别乡村组成“独贵龙”，还有由全旗组成几个大的人民“独贵龙”；有的人民“独贵龙”只举行一次斗争，把问题解决了就解散；有的人民“独贵龙”却有组织、有领导地坚持几十年斗争。

鄂尔多斯人民“独贵龙”的首领叫“阿合玛特”（汉译兄长）。“阿合玛特”由全体人民“独贵龙”成员共同选举产生。每个人民“独贵龙”至少2—3名“阿合玛特”，多则20名左右。“阿合玛特”必须是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率领人民“独贵龙”成员勇于斗争和关于斗争的足智多谋的人，还必须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人民群众中是德高望重的人。这些“阿合玛特”还必须是团结群众，善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能采纳集中群众智慧，并在关键时刻处事果断的人。一般来讲，人民“独贵龙”的一切事情由“独贵龙”全体成员集体讨论决定。任何决定，至少须经“独贵龙”半数以上成员同意方才贯彻执行。

人民“独贵龙”的领导机构叫“陶卜齐·独贵”（汉译是纽扣或者简明）。“陶卜齐·独贵”的主要成员是“阿合玛特”，还吸收少数在家乡有名有望并能出主意有代表

性的人民“独贵龙”的积极分子参加。

参加鄂尔多斯人民“独贵龙”与否，一般来说是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然而一旦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就必须遵守纪律、履行义务，参加该组织的一切活动。每户人家至少须有一个人积极参加。如不参加或中途消极躺倒不干的，人民“独贵龙”就勒令他家备饭敬茶，招待来他家“做客”的人民“独贵龙”大众，用这种经济制裁的办法保证“独贵龙”的组织落实。人民“独贵龙”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互相之间不许打骂。就是“阿合玛特”也不能随便打骂体罚人民“独贵龙”成员。对犯错误“独贵龙”成员也不准逼、供、信。

鄂尔多斯人民“独贵龙”注意打击仇恨、反对破坏人民“独贵龙”的反动分子。如情节恶劣者没收其家产，后果严重者要坚决镇压处决，但一般情况下不采取镇压措施。他们同时对于那些人民中间有梁上歪风邪气者及倒行逆施者进行教训和惩罚。鄂尔多斯人民“独贵龙”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和保密制度，一旦发现有人违反组织纪律和泄密的人，视过失轻重罚款制裁，其款充作人民“独贵龙”运动的活动开支，或者用来扶助“独贵龙”内的贫困户。人民“独贵龙”成员和领导者若丧失立场，腐化堕落，背叛人民利益或成立新“独贵”搞罪恶勾当时，人民“独贵龙”成员就立即聚会“独贵”，宣布其罪行，毫不犹豫地把他们从“独贵龙”内开除出去。

鄂尔多斯人民“独贵龙”是在当地各阶层间公开建立起来的组织形式。但是为了防止敌人对“独贵龙”领导人的暗杀和迫害，人民“独贵龙”的阿合玛特有时对外是保密的。这些阿合玛特在集会时他们的衣着打扮，所坐的位置和普通人没有两样，就是“独贵龙”成员的名单也以“独贵”形状写成圆圈。因此，组织外的人不易看出谁是“独贵龙”的首领。

鄂尔多斯人民“独贵龙”在斗争活动期间一般不脱离生产。“独贵龙”成员们不仅在生产方面互助，而且在经济方面也相互帮助。总之，凡掀起人民“独贵龙”运动的地区，广大人民群众，都是“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使运动得以顺利进行。

鄂尔多斯人民“独贵龙”最初以写呈子告状的请愿形式同反动统治阶级进行非暴力斗争。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日益激烈，被反动统治集团的血腥镇压，激怒了的人民“独贵龙”，为了保卫革命斗争成果，终于领悟到光凭说理斗争是不能使反动派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于是他们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勇敢地拿起猎枪、套马杆、棍棒等，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利用缴获反动军队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用武装割据的形式，长期同反动统治阶级抗衡。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自己占领区内，消灭土匪，清除封建势力，保境安民，发展生产。所以，人民“独贵龙”的武装斗争，将人民“独贵龙”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三)

从历史文献中，可发现“独贵龙”在 1828~1950 年间的部分事迹。即从 1828 年掀起的反对暴君桑斋旺庆扎萨克的乌审旗人民“独贵龙”到 1950 年杭锦旗人民驱逐本旗朝日格布拉格国民党乡公所所长的斗争。

1828~1881 年间掀起的鄂尔多斯人民“独贵龙”运动主要反对封建统治阶级。他们经过多次的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鄂尔多斯伊克昭盟盟长及各旗王公扎萨克的嚣张气焰，迫使一些旗的扎萨克向人民做了一定的让步，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苛捐杂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朝理藩院在乌审旗人民“独贵龙”运动的强大压力之下，免了乌审旗暴君桑斋旺庆的扎萨克官职。这次人民“独贵龙”运动不仅狠狠地打击了本地区封建王公势力，而且有力地打击了腐朽没落的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鄂尔多斯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一步一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伊盟人民所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三重压迫和剥削，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为了摆脱这种压迫和剥削，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同国内外反动统治阶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他们同义和团战士并肩战斗，狠狠地打击了外国侵略

者。但是，卖国求荣的清政府官吏和鄂尔多斯蒙古王公不但支持人民的斗争，反而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人民群众的斗争。这时，鄂尔多斯人民“独贵龙”提出了“上打洋人，下打官吏”的口号。并宣誓“洋人侵略我们，我们就打洋人。谁要阻拦我们打洋人，我们就打谁”。为此，鄂尔多斯人民再次发动了反对洋教堂的斗争。但也因清政府和蒙古王公的出卖镇压而失败。这次的鄂尔多斯人民“独贵龙”运动，活动面广，规模之大，给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打击之重，都比以前有了很大发展。为我国的反帝斗争史增添了光辉篇章。

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开始实行所谓“新政”，对全国人民，尤其是蒙古族人民进行一次新的政治欺骗和经济掠夺。“新政”的一个主要内容是“移民实边”。即在边疆地区大量移民开垦，从中掠取大量押荒银。1902年5月设立绥远垦务局。派理藩院尚书銜兵部左侍郎贻谷到绥远地区督办垦务。接着大批官吏和武装部队陆续来到这里，并且在各旗建立了垦务分局。在丈量过程中，乘机捞取厚利。清廷官吏贪污中饱，垦务机构营私舞弊，再加上地主豪绅包揽大片土地，转手渔利，结果土地不但没有获得正常的开垦和使用，反而使大片牧场沙化。1902~1908年间，清政府在鄂尔多斯地区丈量了24000多顷地，榨取了716200两白银。随之，清政府、蒙古王公同蒙汉人民之间便展开了一场夺地与反

夺地、开垦牧场与保护牧场的激烈斗争。这时期，丹匹勒为首的准格尔旗人民“独贵龙”运动，乌审旗 12 个“独贵龙”运动，昌汉博罗特等领导的杭锦旗 13 个“独贵龙”运动先后暴发，狠狠地打击了清政府、鄂尔多斯王公贵族和大地商，使其“丈垦”不能顺利进行。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封建统治。鄂尔多斯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积极投入这一革命运动。鄂托克旗 8 大人民“独贵龙”继续进行反对本旗封建王公摊派的苛捐杂税的斗争。旺丹尼玛和昌汉博罗特等人在河套南部黄河流域地区会师，组织杭锦旗、扎萨克旗人民，高举起人民“独贵龙”的旗帜进行武装斗争。对盘据在那里的军阀、封建官僚、地主奸商给予有力的打击。乌审旗人民在锡尼喇嘛（原名乌力吉杰尔格勒）的领导下，组织了 11 个人民“独贵龙”运动，同乌审旗封建扎萨克察克都尔色仁进行如火如荼般地斗争。这时达拉特旗人民在阿尤尔扎那梅林的领导下，为推翻本旗封建扎萨克统治，组织了 5 个人民“独贵龙”。这些斗争不但打击了国内外反动派，同时为后来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17 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我国人民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 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蒙古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李大钊等为了充分发动和组织蒙古族各阶层人民参加革命斗争，与当时蒙古族中的国民党负责人白云梯、恩克巴图等上层

人士进行磋商。经中共中央批准，共产国际同意，于1925年10月12日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李大钊派云泽、吉雅泰等蒙古族共产党员参加了大会，鄂尔多斯人民“独贵龙”运动的著名领袖旺丹尼玛、锡尼喇嘛等在北京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等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教育；积极参加了创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活动，并参加了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旺丹尼玛被选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主要负责人之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于1926年春开始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了革命活动。当时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一个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党。因此，很快赢得了鄂尔多斯人民的热烈拥护。“独贵龙”运动领袖锡尼喇嘛等人组织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审旗委员会，建立了人民政权。鄂尔多斯其他旗也纷纷起来斗争，遭到各旗封建扎萨克的镇压，由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局限性和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再加上反动统治阶级的联合镇压，在1929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鄂尔多斯最后一个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审旗委遭到破坏。但是，鄂尔多斯人民的革命斗争并没有停止。“独贵龙”战士们牢记锡尼喇嘛的遗嘱：“我们的朋友从南方来！”望着南方走到延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迎来了新的伟大胜利。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工农红军经过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领导全国抗日运动。1936年间，党中央委员会派出大批干部，率先进